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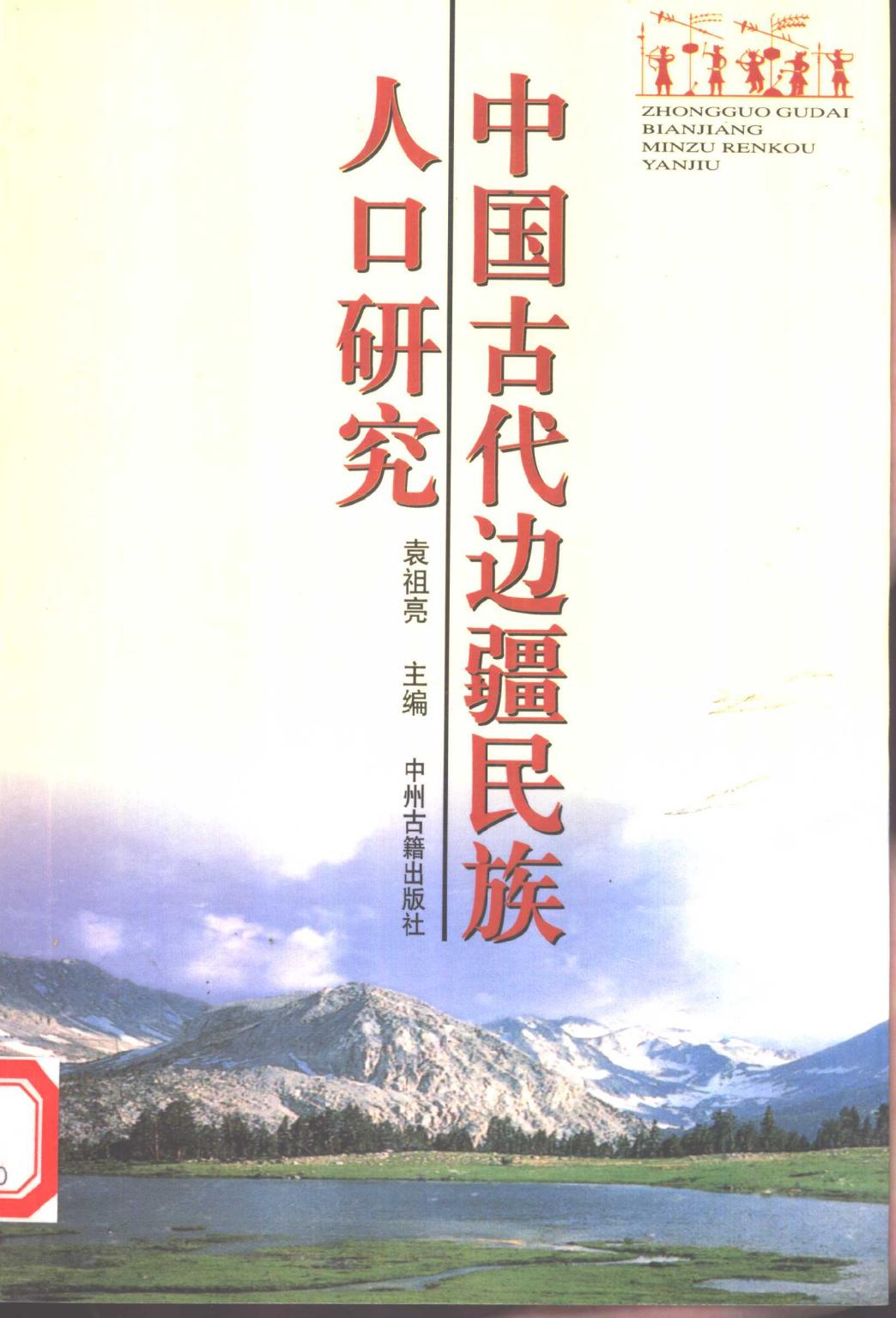
中国 古代 边疆 民族

人口研究

袁祖亮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ZHONGGUO GUDAI
BIANJIANG
MINZU RENKOU
YANJIU

中国
古代
边疆
民族
人口研究

袁祖亮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袁祖亮主编. - 郑州:中
州古籍出版社, 1999.12

ISBN 7-5348-1890-7/K·729

I. 中… II. 袁… III. 边疆 - 少数民族 - 人口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206 号

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

袁祖亮 主编

责任编辑 孟 良 责任校对 洛 华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25 印张 345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348-1890-7/K·729

定价: 28.00 元

2001. 5. 31

考古书店

前　言

《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 1995 年度项目，1998 年 9 月结项完成。在该书出版之际，我要向读者交待一下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的脉络简况，作者在古代人口史研究方面的一些浅见，更重要的是谈谈与本专题研究的有关问题。

一、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的简况

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人口史的研究，在 20 世纪初便有不少文章发表，到了二三十年代，其研究便趋于十分活跃。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认识，人口数量与中国治乱之关系，人口统计，人口流动，人口迁移，户籍制度，户籍与地理分布，人口与土地，以及宋、明、清等朝代的人口问题。其主要代表学者有：梁启超、陈长蘅、吴希庸、马元材、劳幹、谭其骧、史念海、王崇武、张荫麟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对中国古代人口史之研讨仍然十分热烈，王亚南先生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袁震先生的《宋代人口》、梁方仲先生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力作。但是，由于对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的批判，此后人口问题几乎被视为禁区，很少有这方面的文章发表，更不要说有关著作的出版了。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拨乱反正，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在学术界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解除思想禁锢以后，对人口问题的研究不断升温、日趋活跃。现代人口问题之研究暂且不论，中国古代人口之研究，可以说在80年代到90年代，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这一时期，从事古代人口研究的人员较多，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文章数量多，对问题的探讨时间跨度长，上至原始社会，下至明清。对古代人口探讨的方面比以前广泛，其中有对人口规律的探讨，有对断代人口之研究。内容涉及到人口迁移、人口数据考证、户籍制度、人口寿命、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政策、区域人口、民族人口、不同阶层的人口（如宗室、贵族、地主、农民、奴婢、佃农等人口问题）、人口思想、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与婚姻、过剩人口、峰值人口、人口重心等，内容相当广泛。人口问题研究所涉及到的学科领域也比以前多。对同一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入，往往引起十数名甚至更多的学者进行互相争鸣，见仁见智，说法不同。如对宋代人口探讨有不下几十篇文章，还如对人口规律的探讨，对北朝人口、明代人口、清代人口的探讨也有许多篇文章发表，观点看法悬殊，很难达成一致。在研究方法上，进展更大，除了从本学科角度出发去探讨问题外，还能从别的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等角度去探求人口问题。古代人口的研究还出现利用数理知识去解决一些以前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如利用回测法去估算清初的人口，研究某一时代的峰值人口，利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去推测西汉初年人口数量，利用数学知识计算古代人口重心及其移动轨迹等。在资料的运用上，亦有新的挖掘，如利用原始社会遗址出土的人骨材料去推算当时的人口性别比等有关问题，利用吐鲁番文书、利用谱

牒等研究古代人口。总之，自 1978 年以来，在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果。

二、作者在人口史研究方面的俚见

自 1978 年我读研究生时代起，直到目前，20 余年来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人口之研究。在一些学术观点上与人口学界的一些研究者也时有辩论。我研究中国古代人口的理论指南，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口方面的有关论述，马克思的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地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始终是我进行中国古代人口研究的理论指南。我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其自身的规律的，人口的发展变化肯定是有规律可循的，研究人口，首要的是研究人口的发展变化规律，了解了人口规律，才能有指导性地帮助我们去解决相关的问题。有的人把人口现象看成是毫无规律可循，总认为人口数量规模只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后代超出前代，不停地直线增长。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在《从人口数量规模发展变化规律看中国古史分期》和《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第一个专题中曾经认为：生产方式决定人口规律，因为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人们所取得食物的数量和质量不同，医疗卫生技术和条件不同，婚姻形态不同，故人口数量规模的发展变化规律不同。在同一种生产方式下，一定地域内的人口数量规模是一个定值，超过这个定值便会自发调节，不同时代的溺婴现象，特别是溺女婴现象便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自发调节（女婴少，生殖人口就少）。另外，古代人口所进行的充满危险的大迁徙等，都说明了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一定地域内的人口数量是一个定值，超过这个定值便会进行自发调节，使其重新趋于平衡。这种平衡一直维持到

另一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时，即新的生产力所带来的新技术革命到来时，原有的人口数量规模才会登上另一个新的高峰。当这种新生产方式完全取代旧的生产方式，趋于相对稳定时期，人口数量规模便会在新的水平线上也趋于相对稳定，总之，人口数量规模是台阶式增长。

上述观点被中外人口发展史所证实，以中国人口为例，奴隶社会时期的例子尚且不论，整个封建社会，中国人口的数量规模几乎维持在 6000 万的水平上。正史《地理志》当中明确记载了西汉平帝元始二年的人口有 5900 余万，东汉桓帝时期的人口有 5600 余万，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人口处于动乱之中，暂且不论，隋朝炀帝时期有 4600 余万，唐朝玄宗时期有人口 5300 余万，宋朝崇宁年间有人口 4500 余万，元朝顺帝年间有人口 6000 来万，明朝初年和明朝中期有人口 6000 来万，清王朝初年大概亦为 6000 来万。对于上述正史《地理志》的记载，学术界有些学者不赞同，如范文澜先生认为宋代中国有 1 亿多人口，继之有的学者也赞同范老的观点。关于明代人口，台湾学者赵冈早在 1959 年时就认为有 2 亿多人。其实他们的论据不足，缺乏实证，仅仅是推测性质。我们认为《宋史·地理志》和《明史·地理志》中的记载其数字虽然不能说精确，但基本符合实际，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否定的理由仍然显得不足，虽然历史上之人口统计都不是绝对准确的，但不至于出现相差 1 倍之悬殊。

不但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数量规模的发展变化是如此规律，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封建社会时期的人口数量规模也是保持平衡没有大的变化。如根据学者迪维的观点，在公元 750 年以前，全世界人口稳定了 7 个世纪，也就是说，从公元元年到公元 750 年之间，世界人口没有增长，人口数量规模保持稳定。具体来说，英国和锡兰的情况也很类似，英国学者彼得·R 柯克斯

所著《人口学》认为，英国和锡兰在封建社会时期，人口数量规模基本上保持平衡，没有什么增长，甚至有的还稍有减少。《人口学》载：英国在罗马占领时期，人口也许是 100 万，与 1086 年的英格兰土地档案中的数字相同，因而，时隔 1000 余年，人口没有增长。锡兰文明在公元 12 世纪达到了顶峰，而当时的人口大概超过了 19 世纪。埃及的人口数量规模亦有相对稳定时期，公元初埃及的人口至少有 500 万，但随后一个很长时期，至少到 19 世纪，人口仅有 300 万。对于欧洲人口，经济学家汤普逊认为：整个中世纪，欧洲人口变动不大。西德学者南尼也曾指出：欧洲在人口发展的第一阶段（1750 年产业革命以前）工业国人口增长得很慢，人口增长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稳定在 0.5% 以下，人口的出生和死亡率都很高（3%—4%），并且处于平衡状态，确切地说，差异极小。日本学者南亮三郎对欧洲产业革命以前的人口也有论述，他指出：从整个时期进行观察，就会发现，它的生产力就像被限定的生产函数内部所约束的那样，人口成长在这几千年的漫长时间，产业革命使欧洲世界改变以前，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变化。

我之所以举出以上中外例子，是为了说明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即一定的社会形态下，一定地域内的人口数量规模基本上保持一个定值，有时会在这个定值的上下略有浮动，一旦超出这个定值，便会自发进行调节。

三、本课题研究的有关情况

《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 1995 年度申报项目，1996 年 6 月份正式下达，1998 年 9 月份结项。本课题是从秦汉时期开始探索边疆地区民族人口的，为什么从这一时期

开始进行探讨，这是因为，先秦时期边疆地区有的地方尚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社会发展十分缓慢，进步较快的中原地区尚处在奴隶社会的历史阶段。有的专家认为，当时中国周边地区生活的人类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其民族尚未完全形成，而且资料奇缺，故先秦时期边疆地区的民族人口不作专章论及，在前言中仅作一简要介绍。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在中国古代北部边地生活的部族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薰粥，生活在西部地区的主要戎族。《史记·五帝本纪》言说黄帝时之疆域，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其记载基本是一致的。他们是游牧民族，随水草畜牧而转移，其牲畜的种类多为马、牛、羊，另外希有牲畜也有，如橐驼、驴、羸、駔、駒、駘、駢等。无城廓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份地，无文字，以语言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渐渐长大后射狐兔之类，士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所用的长兵器为弓箭，短兵器为刀剑。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全部吃畜肉，衣其皮革，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在舜的时候，生活在北部边疆的有山戎、发、息慎（即肃慎）。《史记·五帝本纪》言当时周围的部族“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

商朝的时候，与北方民族的斗争仍未停止，史称，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在周的早期的时候由于戎狄的进攻，逼使周不断迁徙，周武王的时候，戎夷被赶至河套及其以北地区，迫使其臣服纳贡。到

周懿王的时候，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到周宣王的时候，兴师征伐，并取得了胜利，《诗·小雅·六月》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当时四夷宾服，称为中兴。到了西周末年的時候，由于畎戎的侵逼，周平王不得不进行迁都，城于雒邑，此后不断出现山戎进攻中原封国的情况：“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齐郊”，“山戎伐燕，燕告急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春秋时候，晋是强国，且靠近戎翟，晋文公曾攘戎翟。战国时候，燕、赵、魏也不断与入侵胡人进行战斗，赵武灵王倡导胡服骑射。以上为先秦时期北部边疆地区的部族与中原政权之间的纷争交斗。

在我国东北地区，很早以前居住着肃慎族，前已言及在舜的时候，肃慎曾来进贡。西周成王的时候曾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史记·周本纪》）《国语·鲁语》记载：“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

在今之辽东及其以东地区，生活着貉族，《孟子》言：“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飨饗，无百官有司”，可能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

生活在我国南部边疆地区的古代民族，主要是越族，而越族的情况又很复杂，种类很多，有百越之称。由于文献材料很少记载，故在这里仅仅提及。

在中国古代，生活在边疆地区的部族很多，史书虽然有所记载，但对有的部族仅仅是提及而已，资料十分缺乏，特别是有关人口方面的资料就更为奇缺，所以在探讨边疆地区民族人口时不

能全部论及，只收集当时影响较大者。缺漏部分，以后弥补。

自秦始皇却匈奴、开五岭、抚扬越，汉武帝通西域之后，中国的边疆大致逐步确定下来，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王朝政权归附朝贡，建立臣属关系。当然，随着中央王朝政权的强弱变化，边疆民族政权与中央的关系会发生一些变化，会加强或削弱，但从历史发展的总体看，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友好相处是主流。边疆地区的确定，原则上是以谭其骧先生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依据，但由于边疆地区的民族处于不断的迁徙运动中，情况比较难以把握，在这里需要加以说明。

通过研究边疆地区的民族人口，我们发现，边疆地区民族人口的数量规模，特别是边疆草原地区民族人口的数量规模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下，它的数量规模是一个定值，也就是说有一个极限。如生活在蒙古草原上的匈奴族、鲜卑族、突厥族等，其最高人口数额在 140 万到 200 万中间，如果人口数量规模达到此临界线，草原上的生态平衡就会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是灾荒疾疫的袭击。在这方面匈奴族人口发展的概况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早在楚汉战争时期，由于中原陷于战乱，匈奴族趁机南下，占领了整个蒙古大草原及其周边地区。到了冒顿单于时期人口发展到 140 万来，草原上的牧畜资源已经不能满足匈奴族的需求，于是向四边虏掠特别是南下虏掠十分频繁。汉朝当初无力反击，采取和亲的办法，一方面送宗室女子与匈奴单于，另一方面送去大批财物，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粮食和畜产品，以满足匈奴人的需求。从西汉到东汉的一段很长时间，蒙古草原上不断出现灾情和疫情，特别是旱灾频频发生，这恐怕与草原负载人口过多，生态平衡被破坏有关。关于鲜卑族、突厥族的例子我就不再多举了。在这里我想援引一下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则更能说明上述问题：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

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也就是这种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原侵入世界古代各国。在这里，仍旧是同一个原因在起作用，虽然它的表现形式不同，为了继续做野蛮人，他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人口，这是一些从事游牧、狩猎和战争部落。他们的生产方式，使部落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有大片的土地，到现在，北美的印第安部落的情况也还是这样。这些部落的人口的增长，使他们彼此削减生产所必需的地盘。因此，过剩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为古代和现代欧洲各民族的形成奠定基础的、充满危险的大迁徙。以上为马克思的有关论述，说明农耕或游牧民族都有一个人口数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问题，我国边疆地区民族人口的发展概况证明了马克思有关论述的正确性。

从今日来看，我国北部草原的生态环境与古代相比更为脆弱，昔日著名的一些湖泊和河流已经干枯，步步逼进的沙漠吞噬着成千上万亩良田，故政府决定退耕还林、退耕还牧是正确之举。边疆地区的民族人口的发展亦应加强控制，使其逐步恢复生态平衡，以利边疆地区经济之发展和社会之进步。

此外，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边疆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融合以及这些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融合，数千年来通过征服、迁徙、通婚、文化传播、商贸等形式在不间断地进行着。这种融合增强了相互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和凝聚力，形成了以汉、回、蒙、藏等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处的大家庭，大家为中国经济文化之发展、社会之进步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在这里，我还要交待一下本课题研究的合作情况，在写作过程中，先由袁祖亮拟定大纲及有关要求，然后按大纲分头撰写，

具体分工是这样的。

第一、二章 袁祖亮执笔（其中《乌孙人口及迁徙》为袁延胜的硕士论文）；

第三章 朱和平执笔；

第四章 袁延胜执笔；

第五章 秦新林执笔；

第六章 王瑞平、张诚执笔；

袁祖亮最后审阅全稿。

最后，我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郭孟良先生，他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中州古籍出版社的李景林社长也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书此以表谢意。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指正！

袁祖亮
于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
1999.10.26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目 录

第一章 秦汉时期边疆地区的民族人口

第一节 西域各族的分布及人口概况	(1)
一、西汉时期西域各族的分布及户口	(1)
二、东汉时期西域各族的分布及户口	(6)
三、东汉时期西域人口分布的变化	(8)
第二节 匈奴人口的有关问题	(14)
一、冒顿单于时期的匈奴人口	(14)
二、匈奴人口的分布概况	(22)
三、汉匈战争对双方人口之影响	(26)
四、匈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35)
五、匈奴族生活区域内的灾荒及其原因	(39)
第三节 大月氏、乌孙的人口及其迁徙	(43)
一、大月氏人的迁徙	(43)
二、乌孙人口及迁徙	(59)
第四节 鲜卑族的分布、壮大与迁徙	(83)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地区的民族人口

第一节 西域各民族间的分裂兼并与人口概况	(88)
第二节 鲜卑族的进一步西迁及兵员人口概况	(94)
一、吐谷浑的西迁	(94)
二、拓跋氏的迁徙	(96)

三、拓跋氏的人口及兵员	(99)
第三节 蠕蠕和高车族的分布与人口概况	(101)
一、蠕蠕的分布与人口概况	(101)
二、高车的分布与人口概况	(104)
第四节 东北地区乌桓等民族的分布与人口概况	(108)
一、乌桓的迁徙及人口概况	(108)
二、夫余、挹娄、句丽、东沃沮的分布及户口	(111)

第三章 隋唐时期边疆地区的民族人口

第一节 突厥的族源、人口和迁徙	(116)
一、突厥的族源	(116)
二、突厥的兴衰	(120)
三、突厥的人口数量	(123)
四、内地人口向突厥地区迁移情况	(127)
五、突厥人口向内地迁徙情况	(131)
六、突厥与邻近地方民族政权相互间的人口迁移	(134)
第二节 回鹘的人口与迁徙	(137)
一、回鹘族的兴衰及与隋唐王朝的关系	(137)
二、回鹘人口数量的演变	(145)
三、回鹘人的迁徙	(153)
第三节 吐蕃的族源、人口和迁徙	(161)
一、吐蕃的族源及其在隋唐时期的兴衰	(161)
二、吐蕃人口的民族构成及其人口数量变化	(169)
三、吐蕃的人口迁徙	(179)
第四节 吐谷浑的族源、人口数量和人口迁徙情况	(187)
一、吐谷浑的族源、迁徙及其政权的建立	(187)
二、隋唐时期吐谷浑的人口数量	(196)